

TRANSACTIONS OF
K.C. WONG EDUCATION FOUNDATION
SUPPORTED LECTURES

王宽诚教育基金会

学术讲座汇编

主 编 钱伟长

· 28 ·

2007

上海大学出版社

N53/1019-(28)



NUAA2009071900

N53
1019-(28)1

王宽诚教育基金会

学术讲座汇编

(第28集)

主编：钱伟长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90719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学术讲座汇编. 第28辑 / 钱伟长
主编.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7-81118-201-9

I. 王… II. 钱… III. ① 社会科学-中国-文集
② 自然科学-中国-文集 IV. Z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6745 号

王宽诚教育基金会



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学术讲座汇编》

(第28集 2007年)

钱伟长 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市上大路99号 邮政编码200444

出版人: 姚铁军

*

上海锦康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彩插 1 印张 13.5 字数 320 千字

2007年12月第1版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00 册

ISBN 978-7-81118-201-9/Z·016

上海大学出版社

0001502002

王宽诚教育基金会简介

王宽诚先生(1907—1986)为香港著名爱国人士,热心祖国教育事业,生前为故乡宁波的教育事业做出积极贡献。1985年独立捐巨资创建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其宗旨在于为国家培养高级技术人才,为祖国四个现代化效力。

王宽诚先生在世时聘请海内外著名学者担任基金会考选委员会和学务委员会委员,共商大计,确定采用“送出去”和“请进来”的方针,为国家培养各科专门人才,提高内地和港澳高等院校的教学水平,资助学术界人士互访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在此方针指导下,1985、1986两年,基金会在国家教委支持下,选派学生85名前往英、美、加拿大、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各国攻读博士学位,并计划资助内地学者赴港澳讲学,资助港澳学者到内地讲学,资助美国学者来国内讲学。正当基金会事业初具规模、蓬勃发展之时,王宽诚先生一病不起,于1986年年底逝世。这是基金会的重大损失,共事同仁,无不深切怀念,不胜惋惜。

1987年起,王宽诚教育基金会继承王宽诚先生为国家培养高级技术人才的遗愿,继续对中国内地、台湾及港澳学者出国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后研究及学术交流提供资助。委请国家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教授等逐年安排资助学术交流的项目。相继与(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研中心、德国学术交流中心、法国高等科学研究院等著名欧洲学术机构合作,设立“王宽诚(英国)皇家学会奖学金”、“王宽诚法国科研中心奖学金”、“王宽诚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奖学金”、“王宽诚法国高等科学研究院奖学金”,资助具有副教授或同等职称以上的中国内地学者前往英国、法国、德国等地的高等学府及科研机构进行为期2至12个月之博士后研究。

王宽诚教育基金会过去和现在的工作态度一贯以王宽诚先生倡导的“公正”二字为守则,谅今后基金会亦将秉此行事,奉行不辍,借此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学术讲座汇编》出版之际,特简明介绍如上。王宽诚教育基金会日常工作繁忙,基金会各位董事均不辞劳累,做出积极贡献。

钱 伟 长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

前 言

王宽诚教育基金会是由已故全国政协常委、香港著名工商企业家王宽诚先生(1907—1986)出于爱国热忱,出资一亿美元于1985年在香港注册登记创立的。

1987年,基金会开设“学术讲座”项目,此项目由当时的全国政协委员、历任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大学校长、王宽诚教育基金会贷款留学生考选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学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钱伟长教授主持。由钱伟长教授亲自起草设立“学术讲座”的规定,资助内地学者前往香港、澳门讲学,资助美国学者来中国讲学,资助港澳学者前来内地讲学,用以促进中外学术交流,提高内地及港澳高等院校的教学质量。

本汇编收集的文章,均系各地学者在“学术讲座”活动中的讲稿,文章内容有科学技术,有历史文化,有经济专论,有文学,有宗教和中国古籍研究等。本汇编涉及的学术领域颇为广泛,而每篇文章都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分期分册以《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学术讲座汇编》的名义出版,并无偿分送国内外部分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and 图书馆,以广流传。

王宽诚教育基金会除资助“学术讲座”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之外,在钱伟长教授主持的项目下,还资助由国内有关高等院校推荐的学者前往欧、美、亚、澳等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出访的学者均向所出席的会议提交论文,这些论文亦颇有水平,本汇编亦将其收入,以供参考。

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学务委员会

凡 例

(一) 编排次序

本书所收集的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学术讲座的讲稿及由王宽诚教育基金会资助学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均按照讲学或参加会议日期的先后编排刊列，不分类别。

(二) 分期分册出版并作简明介绍

因文稿较多，为求便于携带，有利阅读与检索，故分期分册出版，每册约 150 页至 200 页不等。为便于读者查考，每篇学术讲座的讲稿均注明作者姓名、学位、职务、讲学日期、地点、访问院校名称。内地及港、澳学者到欧、美、澳及亚洲的国家和地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均注明学者姓名、参加会议的名称、时间、地点和推荐的单位。上述两类文章均注明由王宽诚教育基金会资助字样。

(三) 文字种类

本书为学术性文章汇编，均以学术讲座学者之讲稿原稿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者向会议提交的论文原稿文字为准，原讲稿或论文是中文的，即以中文刊出，原讲稿或论文是外文的，仍以外文刊出。

目 录 CONTENTS

清中前期诸帝对天主教认识的演变	陶飞亚 (1)
从「读者反应」及「接受」理论角度探讨使用者为本设计	邵健伟 (16)
愉悦性产品: 公共空间设施与适用性	邵健伟 (27)
设计理论评论: 秩序与混乱	邵健伟 (35)
唐俑与女性生活	齐东方 (49)
何家村遗宝的埋藏地点、年代和所有者	齐东方 (61)
提升专业教学力量的精神觉醒	过伟瑜 (72)
大陆板块俯冲和折返的化学地球动力学	郑永飞 (85)
Discrete Time Dynamic Multi-leader-follower Games with Stage-depending	
Leaders under Feedback Information	聂普焱(105)
Studies of Key Technologies for Large Area Cdtethin Film Solar Cells	冯良桓(123)
Examination of Throughflow in a Radial ESF Clutch	陈淑梅(133)
The History and the Culture to Fight Against Flood Along the Gan River in	
Poyang Lake Basin	傅 春(140)
A Mathematical Model of the Dynamics for anti-HBV Infection Treatment	
with Peginterferon Alfa-2a	闵乐泉(144)
A Mathematical Model for Adefovir Dipivoxil Anti-HBV Infection Treatment	闵乐泉(149)
Recent Activities on Directional Solidification at the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olidification Processing	刘 林(155)
Enhanced and Decreased Group Velocity in Compositionally Graded Films	
of Nonspherical Particles	高 雷(163)
A Protein Structure Prediction Scoring Function Based on Backbone Dihedral	
Angles and Pairwise Distance of Residues of the Protein	章 鲁(174)
Application of Cointegration Testing Method to Condition Monitoring and Fault	
Diagnosis of Non-Stationary Systems	陈 前(179)
Effects of Magnetic Field Direction on Texture Evolution in a Cold-rolled IF Steel	
Sheet During High Magnetic Field Annealing	赵 骥(191)

清中前期诸帝对天主教认识的演变

陶飞亚*

(上海大学 文学院, 上海 200444)

E-mail: fytao@mail.shu.edu.cn

清中前期(顺治朝到嘉庆朝)天主教在清朝皇帝的谕旨中经历了从“正教”到“邪教”的变化,显然这与皇帝们对天主教的认识有关,也决定了朝廷天主教政策的走向。不过,这一变化如何发生的,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前后有巨大反差的变化?学术界讨论过各个皇帝对天主教的政策,但较少涉及他们个人对天主教的看法,也没有在历史的顺序中观察这种变化的原因。因此,本文试图把清中前期各朝对天主教政策联系起来考察,主要讨论这样一些问题。第一,这一阶段帝王与传教士的关系及他们对天主教的态度;第二,他们态度变化的原因是由于从对外关系角度对西方殖民势力的警觉,还是对内对社团性宗教的担忧?抑或是对天主教伦理思想和神学思想的排斥?第三,是从传教士角度看,为什么在康熙之后对帝王的影响日渐薄弱?近年清宫档案的整理出版和耶稣会士书简等材料的出版,使得这些问题的求解有了新的可能。

1 康熙的宽容与查禁

清代中前期的天主教传播,大致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康熙中期的宽容传教,另一个是康熙晚年开始的禁教,以后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各朝,直到鸦片战争,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不过,在鸦片战争之前,在清政府与天主教的冲突中,禁教与宽容之间,清政府是有主动的选择权的。又因为是皇权专制政治,在某种意义上,皇帝的好恶与其禁教与否又有直接的关系。不过,皇帝的好恶也并非完全是随心所欲,他们也受到多方面的制约。其中有历史传统的影响,更包括他们身处的社会环境。

就天主教在中国传播而言,清廷直接继承了明朝末年留下的双重历史遗产,这个遗产是与天主教传教士本身的特点相联系的:耶稣会士们一方面是宗教家,另一方面又是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同时又是一些公共关系的高手。由于利玛窦的宫廷和上层传教策略,朝廷与传教士建立了直接接触的良好关系。这对清初的天主教活动意义极为深远。

* 陶飞亚,教授,上海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由王宽诚教育基金会资助,于2006年4月赴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讲学,此为其讲学的有关内容。

另一方面,是明末对天主教传教“阴谋论”的恐惧。传教士进入中国,是自从佛教入华后第二次对中国人精神生活的重大冲击。而且与佛教不同,源自欧洲政教二元体制下的基督教,是参与民众日常精神生活的社区宗教,这引起没有这种传统的社会的不安。因此就有了明末反教知识分子关于天主教传教目的的种种假设。明万历四十四年五月、八月、十二月沈樞连上三疏攻击天主教,其要害有三点。第一,认为天主教“暗伤王化”、会破坏儒家学说的权威,破坏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是“儒术之大贼”、“圣世所必诛”。第二,认为天主教“诬惑愚民”,“及其党与勾连,则将干戈取之而不足矣”,要防范天主教成为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以宗教相号召、与朝廷对抗的政治力量。第三,引用天主教国家夺取吕宋国政权的例子,认为传教士“付戎于莽,为患叵测”。¹

沈的这些看法,从大历史的背景来看,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十六世纪上半叶,是葡萄牙人入侵亚洲,建立殖民大帝国的时代。葡萄牙人1511年攻下马六甲,1517年航抵广州海面,1533年占据澳门,1542—1544年北上日本。西班牙在麦哲伦航抵菲律宾(1521年)的半个世纪后(1570年)征服吕宋。葡西两大海上帝国力量在南中国海上出现,必然招起中国人的恐慌,纷纷臆测它们来自何方。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沿海的商业与海盗问题已经引起中国官方的注意。这促使中国人对来历不明的西洋陌生人更加猜疑,尤其当后者还强占中国的土地(澳门),甚至屠杀中国的海外侨民(1602年吕宋屠杀事件)。同时,只要中国人对外来事物不能理解其来龙去脉,不能掌握这种关系的发展,恐惧和不安的心理就无法消除。²但是,同样因为缺乏了解,也往往会夸大这种潜在的危險,而走向另一个极端。

就明末的现实情况来看,沈樞则是在提出一种夸大危险的假设。这种假设认定这个外来宗教对传统文化的威胁性,深恐它将在社会造成动荡不安。另外,在历史经验中宗教是可以用来集结人群服务于政治目的的,这种活动威胁到王朝统治屡见不鲜。最后,最有普遍意义的是时人对中国之外的情况极度缺乏了解,其中包括了对天主教、对传教士、特别是对这种宗教和传教士来自的国家几乎一无所知,无知导致无端自大或者夸大危机。就事论事,沈的三疏对中外关系的认识基本上是在错误的世界地理知识之上的,是一种非理性的耸人听闻。但这种对想象中的西洋宗教和欧洲海上势力危害性的恐惧,无论在统治者还是一般人民的思想中都能唤起强烈的共鸣。

清初,清廷与天主教的关系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前提下展开的。明清政权更迭之际,汤若望以修纂历法的缘故,迅速重建了耶稣会与朝廷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汤若望在顺治尚且年幼之际,就与小皇帝建立了极为亲密的关系,以致于小皇帝称呼汤若望为“玛法”。顺治亲政后汤若望不断得到嘉奖和殊荣,使得朝廷与传教士合作的传统更得到了加强,奠定了天主教在中国宫廷初步的正面形象,这对初入中国的天主教会极其重要。

鳌拜等辅政大臣执政期间,新皇帝与传教士之间的关系尚未建立,辅政大臣仇视传教士,朝廷与传教士的关系就向阴谋论一面倾斜。康熙三年(1664年)杨光先发起对耶稣会

¹ 夏瑰琦编:《圣朝破邪集》,香港,宣道出版社,1996年,第58—67页。

² 纪念利玛窦来华四百周年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会议秘书处编:《纪念利玛窦来华四百周年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358页。

士汤若望的攻击,除了指责《时宪历》用“依西洋新法”五字,是“明示天下以大清奉西洋正朔”之外,杨也声称:“若望借历法以藏身金门,而棋布邪教之党羽于大清十三省要害之地,其意欲何为乎?”,“大清因明之待西洋如此,习以为常,不察伏戎于莽,万一窃发,百余年后,将有知予言之不得已者。”杨还认为宣教士图谋颠覆清朝,以修历为名,阴行邪教,窥探朝廷机密,屯兵澳门,图谋不轨,因此要求将汤若望等正法。实际上,杨的说法,也不出沈樵的思想、政治和中外关系三个方面的阴谋论。虽然从事实层面看,杨是捕风捉影、夸大其词,但其抹黑手段,在舆论上对天主教极其不利。杨把天主教问题与国家安全结合在一起,使得假设的西方宗教阴谋论在有清一代成为打击天主教的利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杨光先在《请诛邪教状》是清初最早在官方文书中用“邪教”来指责天主教的。

康熙亲政后平反了这一案子,重新恢复了皇帝与传教士之间的接触。还要指出的是,康熙在某种程度上与顺治一样,是在青少年时期就接触到传教士及天主教,而且其与传教士在宫中过从的时间比顺治长的多,关系还要密切。康熙对传教士的赞赏,首先是其事工;其次已经延及宗教。³正如许多论者指出的,在清代的君主中,康熙对天主教、对西方的认识和与传教士友谊方面远非其后继者可比。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写给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信中写道:“这位于1722年12月20日去世的君主是人们在许多世纪中才能见到一个的那种非凡人物之一,他对自己的知识面不加任何限制,亚洲所有君主中从未有任何人像他这样爱好科学和艺术。……因此,耶稣会传教士与这位伟大的君主谈论的最多的也是你们科学院。”⁴康熙对天主教的弛禁,正是在对传教士对清廷的贡献及其对西方了解基础上作出的决定。

同时,不能忽略这种宽容也是宫廷中传教士费尽心机主动争取来的。因为,来自朝廷中官员对西洋宗教的排斥和抵制始终存在的。耶稣会士洪若翰记载康熙作出宽容敕令颇费周折时说:“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大臣们怎么敢于几次三番地做同样的抵制。在中国大臣极受尊重,不仅下级服从上级,而且有时也受到皇帝的尊重。中国人始终厌恶外国人,这种厌恶使得在这一事件中,有人公开地宣称反对基督教在中国自由传播。”⁵

但是,当时传教士在宫廷中与皇帝的朝夕相处,使他们有机会在最高统治者面前直接为自己辩护。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广东石碣镇总兵陈昂从沿海安全角度奏请禁教。耶稣会传教士也针锋相对向皇帝逐条申辩。针对陈大事渲染传教“阴谋论”,传教士认为“大凡值得令人担心之事,在一段时间后总会发生的。因此,既然至今未发生任何类似事情,可见无任何理由担心。倘有人心怀密谋,他们虽能隐瞒一时,最终总会暴露。因此,若(欧洲)商人及传教士有类似计划,他们怎能在近二百年时间里毫不暴露呢?前朝末年,帝国纷乱四起,许多人公开作乱;如此天赐良机,欧洲人为何不用以实现人们归咎于他们的险恶计

³ 康熙御题宣武门内天主堂律诗,《正教奉褒》,见辅仁大学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陈方中编:《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60页。

⁴ 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法兰西科学院诸位先生的信(1723年5月1日于北京),见[法]杜赫德编,[中]郑德弟译:《耶稣会士书简集》II,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286、287页。

⁵ [杜赫德]编,[中]郑德弟、吕一民、沈坚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I,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282页。

划呢？难道他们要等在本朝治下四海升平、帝国富足、兵强马壮后再动手不成？”⁶

针对陈认为传教士是潜伏于帝国内部敌人的说法，传教士从自身实际状况出发分析道：“有人还可能说：欧洲国家离此确实太远，因此不必担心它们从外部进攻，但是，允许欧洲人留在帝国混迹于我们之中，这岂非养敌于内吗？我们答曰：显然这一方面更无需担心了。以传教士身份前来帝国的欧洲传教士自幼就潜心学问，他们只接触书本。岁数稍长后他们便在各修会中过修道生活，而且只关注完善自身。精通各门学问后他们便致力于传播福音，一心只想让所有人获得万物本源之认识，以便人人都洗心革面，配享天福——因为天堂才是他们真正的祖国。”传教士们还解释说：“他们在中国过的是什么生活啊！他们远离红尘，每天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祈祷和默想圣事，其余时间用于苦修和行善。他们蔑视世间俗事，只以公正仁慈为念。人们怎能怀疑此种性格之人会起意造反？有这种打算的人，他们或受野心推动或是想望财富，如自己不享用，至少也以遗福后世为乐。然而传教士们弃绝婚姻和尘世爵位，他们既无家庭、也无需要抚养子女。人们能找到一个既不为自己也不为家人、却犯下了谋反罪的疯子吗？”⁷

这篇申辩最后宣称：“传教士入华已将近二百年，在这些有幸生活于本朝和前朝的人身上，人们只能看到公正和诚实。……多年来，欧洲人有幸在宫中为皇帝服务而且伴驾出巡，宫中和外省从未有人怀疑过他们。以前只有杨光先轻蔑地诬蔑他们，如今的陈昂则以同样的轻率重弹老调。”⁸这篇辩诬宫廷中传教士用汉语写成上奏的，它是否对清廷君臣有影响呢？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即禁教这一年，康熙在给西教士苏霖等人的谕旨中还说：“自从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贪污淫乱，无非修道，平常无事，未犯中国法度。自西洋航海九万里之遥者，为情愿效力，朕用轸念远人，俯垂矜恤，以示中华帝王不分内外，使尔等各献其长，出入禁廷，曲赐优容至意。尔等所行之教，与中国毫无损益，即尔等去留也无关涉。”这里看得出有传教士自我辩护词的痕迹。

因此，康熙的禁教，并不是出于前面提到的沈、杨渲染的西方威胁论，而是对罗马教廷在一个非基督教国家强行禁止该国礼仪的回应。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12月25日）康熙命人传旨罗马教皇特使嘉乐：“……尔教皇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尔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国传教之西洋人亦属无用；除会技艺之人留用；及年老有病，不能回去之人，仍准存留，其余在中国传教之人，尔俱带回西洋去。且尔教皇条约，只可禁止西洋人；中国人非尔教王所可禁止。其准留之西洋人着依尔教王条约，自行修道，不许传教。”⁹

当康熙在五十九年（1721年1月18日）读到译成中文的《自登基之日》时，朱批“览

⁶ 耶稣会传教士冯秉正神父的信（1717年6月5日于北京），[法]杜赫德编，[中]郑德弟译：《耶稣会士书简集》II，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202页。

⁷ 耶稣会传教士冯秉正神父的信（1717年6月5日于北京），[法]杜赫德编，[中]郑德弟译：《耶稣会士书简集》II，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203、204页。

⁸ 耶稣会传教士冯秉正神父的信（1717年6月5日于北京），[法]杜赫德编，[中]郑德弟译：《耶稣会士书简集》II，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205页。

⁹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4页。

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进来臣条约,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¹⁰罗马教廷禁止中国信徒祭祖拜孔时,那种天主教将危害中国传统思想的假设,就有变成现实的可能。康熙的禁教针对的是这种与传统相对的“礼仪”以及这种“礼仪”对中国朝廷绝对权威的挑战,而并非出于对设想中的军事侵略的防范。在康熙宫中,传教士仍然在皇帝身边,皇帝生气的是罗马教廷,要查禁的另一批不遵中国礼仪的传教士。相应地,康熙的禁教,是法理上禁止,在实际行动中并没有选择主动打击教会的措施。即使在康熙禁教时,只是把天主教说成“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并不同意把天主教看成是“邪教”。¹¹

不过,这种关于西洋宗教有害还是有益,与外来侵略关系的争论和认识,尤其是对外来宗教的认识和传教士的自我辩解并没有作为一种知识流传下去,或者这种认识的传播极其有限,即使在其皇位继承人中也是如此,这势必会影响到其继承人的天主教政策。

2 雍正的假设

雍正皇帝本人与传教士的关系,不可与顺治、康熙同日而语。但雍正还是聘用传教士为西学教师。不过,当传教士直接为其服务时,雍正已经人届中年,在思想上已经不是青少年那样的易感人群了。尽管雍正还是亲王时,对传教士有过友好的举动,但传教士卷入皇位继承之争已经令其对传教士产生恶感。不过,雍正时代,康熙朝对传教士友好举动朝野记忆犹新,宫廷中传教士还在为皇帝服务,传教士们还有直接与皇帝对话的机会。因此,雍正的禁教,也受到了这种现实形势的限制。对此,耶稣会士书简中有比较详细的纪录。雍正二年(1724年)清廷大规模禁教,传教士巴多明、白晋和戴进贤通过种种努力向雍正辩解和求情。五月十一日(7月1日),雍正接见了这几名传教士,冯秉正随后在信中报告了雍正对传教士的谈话:

朕的先父皇教导了朕四十年,在朕的众兄弟中选定朕继承皇位。朕认为首要之点是效法于他,一点也不偏离他的治国方略。福建省某些洋人试图坏吾法度,扰乱百姓,该省主管官员们向朕告了他们的状。朕必须制止混乱,此乃国家大事,朕对此负有责任。如今朕不能够也不应该像朕只是一个普通亲王时那样行事了。

你们说你们的宗教不是伪教,朕相信这一点;朕若认为它是伪教,谁能阻止朕摧毁你们教堂、把你们赶走呢?那些以教人积善积德为名煽动造反的宗教才是伪教,白莲教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如果朕派一队和尚喇嘛到你们国家传播他们的教义,你们该怎么说呢?你们如何接待他们呢?

利玛窦于万历初来华。朕不想评论当时中国人的做法,朕对此不负责任。但当时

¹⁰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6页。

¹¹ 辅仁大学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陈方中编:《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62页。

你们人数极少，简直微不足道，你们的人和教堂也不是各省都有，只是在朕先皇当政时期各地才建起了教堂，你们的宗教才迅速传开。我们当初看着这一切，却什么也不敢说。但纵然你们骗得了朕的先皇，别指望也来骗朕。

你们想让所有中国人都成为基督徒，这是你们宗教的要求，朕很清楚这一点。但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变成什么呢？变成你们国王的臣民。你们培养的基督徒只承认你们，若遇风吹草动，他们可能惟你们之命是从。朕知道目前还没什么可担心的，但当成千上万的船只到来时就可能出乱子。

中国北面有不可小看的俄罗斯人的王国，南面有更值得重视的欧洲人和他们的王国，西面则有策妄阿拉布坦——我怕他到中国兴风作浪，因此把他约束在其地盘内不准进入中国。随沙皇使臣伊斯迈罗夫（Ismailioff）一起来华的兰给（Lange）请许俄罗斯人在各省设立代理商行，但遭到了拒绝，我们只准他们在北京和土库班沁（Tchu-Kou-pai-sing）互市，最多也只能扩大到喀尔喀（Kalkas）地区。同样，朕允许你们留在这里和广州，只要你们不贻人以任何抱怨的口实，就可以一直住下去；但日后你们若引起抱怨，那么无论这里还是广州，朕都不让你们住了。朕绝不愿意你们在地方各省居留。朕的先父皇屈尊俯就，让你们居留外省，他在文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就大受损害。先贤之法不容任何更改，朕绝不允许朕当朝期间在这方面给人留下什么把柄。朕的子孙们即位后，他们将按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行事，朕对此无需操心，正如朕对万历的做法不会操心一样。

此外，你们不要以为朕对你们有什么敌意或是朕想压迫你们，你们知道朕在只是皇子的时候是如何对待你们的。辽东有位官员是你们的一个基督徒，因不祭祖而受到全家反对，你们当时很为难，求朕帮助，朕调解了这件事。朕如今是以皇帝身份办事，惟一关心的是治理好这个国家。¹²

雍正的这段讲话有不同的版本，但大致的意思是一样的。¹³这里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他是为了“治理好这个国家”而查禁天主教的，甚至批评康熙当年是受了传教士的欺骗。他在这里也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提出了后来被人一再引用的一旦中西冲突，中国天主教信徒会支持同宗的外国侵略者的著名假设。这成为雍正以后各朝力图禁绝天主教深远的思想基础，甚至“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都可以从这里找到一些源头。

雍正对传教士威胁清朝统治的假设深信不疑。他自己镇压罗卜藏丹津的行动，更被认为是这种假设的现实性。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数次接见教皇使者及在京的传教士，再次表达了对天主教在华传播的看法，捷克耶稣会士严嘉乐记下了接见时的情形：

皇帝又谈起各种宗教信仰，他说：你们是中国的客人，是来宣扬上帝的《圣经》的；同样，喇嘛、佛家僧尼还有阿拉伯人也是中国的客人。他说，每个大帝国都有符合本国国情的经书。中国有自己的经书——儒学，满人、蒙古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欧洲人都有自己的经书。他说，各国的经书都是好的，因为每一种经书都认为人必须为善并教诲别人为善。“但是，如若要将各种宗教信仰加以比较的话，”皇帝说，“哪

¹² [法]杜赫德编、[中]郑德弟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II，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338、339页。

¹³ 《中国天主教史概论》，第255、257页。

种宗教能与中国文人的学说——儒学相提并论呢？”但他说，所有的宗教信仰的目标都是同样的，是多位一体的。“天”、“佛”、“天主”，还有穆斯林信奉的“安拉”都是一回事。用一种宗教去反对另一种宗教，这有违常理。他说：“你们欺侮佛教徒，反对他们；他们反过来又一报还一报，攻击你们的《圣经》。虽则每一种宗教本身都是好的，但它们的信徒中间总会有坏人，这些人违犯教义和教规。对于这些坏人必须加以处置，但处置他们并不等于压制他们信的宗教。我为了平定罗卜藏丹津的叛乱，杀了成千上万的喇嘛，毁掉了多少喇嘛庙呀！”

巴多明说，这些喇嘛是咎由自取。皇帝接着说：“这倒也不是。其实这些（死掉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喇嘛，他们不守教规，实行武装叛乱，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同样，我驱逐了不幸的教士穆敬远，因为他煽动众人，介入了本与他无关的事务中。”为了表明他的这些论断的正确，皇帝两三次放声大笑。他说话时口若悬河，充满自信，我们这些教士既没有机会回答，也不敢提出异议。¹⁴

显然，雍正对宗教的情况了解已经不少，但在他看来：第一，什么宗教也不能与儒学相比，也就是儒学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第二，宗教之间会发生纠纷，如中国天主教佛教互相攻击；第三，他特别强调宗教本身是好的，但中间总有坏人，如喇嘛教与罗卜藏丹津的叛乱；第四，他认为耶稣会士是要“全中国都信奉你们的教”。所以，他才要禁止传播天主教。因此，他禁教的理由与康熙有很大的不同了。

同年11月雍正再次接见传教士：

（教皇使者）葛大度说：“当我们回到教皇身边，向他报告陛下对他本人、对他的信件和礼品的好感，并回赠了丰厚的礼品，报告我们两人在这里受到的礼遇和恩宠，教皇会感到无比高兴。可是，当他问起这里的传教士情况如何，而得到的回答却是：传教士必须从所有的省份撤离，只在北京和广州能留下几人，这时他的心中一定会充满了悲伤，这种悲伤大大超过他听到前面的消息所感到的欢乐。假若陛下能恩准传教士们返回他们原来的工作地点，定能使年事已高的教皇益寿延年。”

对此皇帝回答道：“朕若想准许他们返回原地的话，早在你们为此事上奏折之时朕就会同意了。其实，我并没有叫人拆毁教堂，我也没有驱逐欧洲人，没有迫害基督徒，我也没有说你们的宗教不好呀。在中国的传教士一共有多少？”

下面禀告他说，共有四十人左右。

皇帝说：“他们到底想做什么？他们人这样少，我们国家这样大，分到每个省份只有两三个人，更不用说他们还不懂中国话。还有，如果信奉你们宗教的我国臣民违犯了我国的法律，你们将怎样惩处他们？你们手上又没有权力，难道你们想要朕授予你们惩处朕的臣民的权力吗？朕允许你们在宫廷和在广州居住就够了，对你们也安全一些。朕知道，你们的意图是使全中国都信奉你们的教。既然如此，你们何不先让整个宫廷和全广州市都变成信奉基督教的呢？到那时想叫全国都信基督教就不大费事了，你们可以让那些信基督教的北京人、广州人去办，比你们自己去办容易得多。此外你们还说，你们的教和我国的儒

¹⁴ [捷克]严嘉乐著，[中]丛林、李梅译：《中国来信（1716—1735）》，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2 年 9 月，第 49 页。

教没有多大区别。果真如此,你们又何必把你们的教强加于我们呢?如果两者还是有区别,那么你们应该知道,我们是不会为了你们的宗教而放弃有几千年历史的儒学的。如果你们说基督教优于儒教,那么就应该对比两者的基础,公开辩论。”¹⁵

从这段话来看,雍正的禁教也是对传教士在康熙年代的发展有所警觉了。这可能与康熙朝天主教传教士大部分在城市发展,引人注目有关。历来雍正被看成是严厉打击传教士者,但应注意到的是,在这个阶段,传教士们还经常有直接“面圣”直接与皇帝对话的机会。而雍正一直承认天主教是好的宗教,还必须为其打压天主教会向传教士们作出解释,禁止天主教也是不彻底的,在北京和广州的传教还是被允许的。《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中也认为“雍正欲见好嫉恶圣教之文人学士,又惧人议其不能继承先志。故虽京外各省之西洋人,尽行驱逐,而在京之西洋人,于行教立堂诸事,仍听其自便,一遵先朝成规。”¹⁶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正在指责苏努家族信教的上谕中也只用“信徒西洋外国之教”来定性天主教。¹⁷雍正十年(1732年),雍正谕旨三十名传教士“俱令出国”,“惟德理格,与皇上为太子时,曾授皇上西学。皇上念其前功,不忍加罪,不时犹蒙召见。当时圣教之得存于中国,而未尽灭绝者,皆赖德理格一人,在御前密为周全,他人皆不得而知也。”¹⁸沙如玉(Valentin Chalien)神父致韦塞尔(Verchere)神父的信中说:“雍正心灵深处就仇视基督教及其使徒们,他长期以来都会毫不踌躇地使传教士们感到了其恶意的影响。然而,雍正始终向巴多明神父显示尊重他的表示,并且对他以礼相待。雍正皇帝多次意欲铲除基督教并驱逐北京的传教士们。巴多明神父以回答问题的智慧,直接向皇帝呈奏,或者是通过其保护人和朋友们的说情,经常会避开风浪而拯救我圣教。”¹⁹

雍正虽然憎恶天主教,但也有两个原因使他做的不致太露骨,甚至有时也示恩于教会和传教士。一是不愿担当改变康熙遗制之罪名,同时也惧怕舆论批评;二是他为了自身的利益,又须保留若干西教士来修治历法。处于这种自相矛盾中雍正,必须自圆其说,并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雍正二年十二月他给礼部一奏疏中说:“朕于西洋教法,原无深恶痛绝之处,但念于我中国圣人之道,无甚裨益,不过聊从众议耳。尔其详加酌量,若果无害,则异域远人自应一切从宽。尔或不达朕意,绳之过严,则又不是矣。”²⁰

但雍正对天主教的认识远不如康熙。冯秉正在一封信中提到:雍正十二年(1733年3月18日),皇帝召见传教士,指责传教士不孝敬父母。教士们向雍正辩解人们对传教士的指控出于杜撰,当雍正听到传教士们讲基督教的十诫中有孝敬父母,传教士已经拜过清帝的陵寝,并得知传教士也有“先祖的灵牌”并且还有“他们的画像”时,“显得

¹⁵ [捷克]严嘉乐著,[中]丛林、李梅译:《中国来信(1716—1735)》,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9月,第53、54页。

¹⁶ 辅仁大学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陈方中编:《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02页。

¹⁷ 世宗宪皇帝实录(一)/卷五十九/雍正五年七月,907-1

¹⁸ 辅仁大学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陈方中编:《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87页。

¹⁹ 沙如玉(Valentin Chalien)神父致韦塞尔(Verchere)神父的信(1741年10月10日于北京),[法]杜赫德编,[中]耿升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IV,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243页。

²⁰ 雍正朱批谕旨,转自张泽:《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台北,光启出版社,1992年,第33页。

很惊奇”。他下令大臣了解基督教的教法，此后雍正不再重提类似批评。传教士在奏章中谦卑地说：“皇帝仅通过阅读经书，便会使这些诬词不攻自破，因为经书中会解释基督宗教的职责义务。”²¹

雍正的世界知识也不能与康熙同日而语。传教士记载说：“皇帝降旨要在距离此地二十华里处兴建一所新的宫殿。前天，他召见了我们。赐茶之后，便当着我们的面把天主教大骂了一通，并把它与那些邪恶教派相提并论。不过，他也承认天主教会带来裨益。他谈到教皇和欧洲各国国王时，则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看来他所受的教育远不及其父皇。”²²

因此，雍正的禁教出自多种原因，个人的好恶与出自对国家安全的考虑都影响其天主教政策。但雍正的好恶和对天主教传教与国家安全的判断，又是基于一种对宗教和世界状况不全面的了解，或者说知识不足的前提下作出来的。这种知识的缺乏导致了对前朝遗存的阴谋论已经缺乏康熙那样的分析能力，也不像康熙那样能在保持某种警觉的前提下，维持中外交流借助西人西学以补中学之不足了。

3 乾隆的反复

乾隆朝仍有许多传教士留驻北京。乾隆三年，北京共有耶稣会士二十二人，其中六人在宫廷中供职，五位是华籍会士。耶稣会辖三堂，传信部辖二堂。其中有修历的，画师、建筑师、表匠、医药师、翻译、制图等行家。乾隆四年（1739年）耶稣会士汪达洪供职清廷制造钟表。乾隆九年（1744年）蒋友仁在清廷参与建造装修圆明园工程。乾隆十年（1745年）艾启蒙以绘画服务宫廷。乾隆十五年钱德明以通汉学被乾隆召进北京。乾隆对传教士比较信任，也优待传教士，给传教士的薪俸比一般官员要高。他在召请蒋友仁为他圆明园修西洋水法时，不但“温语嘉奖”，而且“飭工部人员悉听指挥；又准其随意出入禁中，不拘常例。”深得乾隆喜爱的传教士有郎世宁、蒋友仁、王致诚等。

此时，宫廷中的传教士还能如前朝一样，当出现反教风波时，传教士们还能直接向皇帝申辩。如乾隆酷爱西洋画，对意大利籍耶稣会士郎世宁宠爱有加。因此，当乾隆二年（1738年）厉行禁教时，就发生了郎世宁请求康熙缓颊之举。1738年12月14日，乾隆到郎世宁画室，郎世宁跪求皇帝不要禁教。皇帝回答说：“就你们而言，朕丝毫没有禁止你们的宗教。你们可以自由地修习它，但我们的人不应该信仰它。”修士回答说：“我们很早以前就来到中国，正是为了向中国人宣讲这种宗教。您高贵的祖父康熙皇帝，曾颁布在整个帝国中的容教令。”由于该修士是眼含热泪而呈奏这一切的，所以皇帝也受感动了，他扶起了郎世宁修士，并向此人许诺他将再次研究这桩案件。郎世宁的求情使乾隆下旨缓和了北京辟教的形势。²³天主教传教史也认为“当时皇上于西士，虽严禁其传教，而优待之礼，犹未衰也。”²⁴

²¹ 耶稣会传教士冯秉正神父致同一耶稣会某神父的信（1755年10月18日于北京），[法]杜赫德编，[中]耿升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IV，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01、102页。

²² [法]宋君荣著、沈德来译，罗结珍校，杜文凯编：《清代西人闻见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42页。

²³ [法]杜赫德编，[中]耿升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IV，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85页。

²⁴ 樊国梁：《燕京开教略》，见辅仁大学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陈方中编：《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台北，辅

在这种情况下，乾隆在天主教问题上，也仍然是继续在宫中重用，但在京外地方上打击传教活动。而且乾隆在禁教问题上立场反复多变。尚若翰（Jean-Gaspard Chanseaux）就乾隆十一年（1746年）爆发的全面教案写道：

今天当朝的乾隆皇帝将其严厉程度发展得更远。他下令仔细地搜捕所有那些于其父皇或在他统治下重返中国内地、在那里秘密而颇有成效地工作的传教士们，传教士们志在培育原有的基督教会口并建立新的基督会口。乾隆甚至还不满足于将《福音书》的传播者从中华帝国驱逐出去，而且还将其中的五人连同一名教经先生一并判处死刑。这几乎是在中国从未出现过的事端。他以一种公开判决而为我圣教制造了许多殉教者。²⁵

乾隆十九年（1754年10月29日）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在信中写道：

由于皇帝的行为始终都不能持之以恒，他在作出任何决定时始终都神秘莫测。他确实确实是仇恨基督教，但出于礼貌，他又谨慎地与我们打交道，在人前能善待我们，这是由于他害怕与其父皇之间的差异过分惹人注目。²⁶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9月15日）汪达洪（de Ventavon）信中写道：

皇帝和大臣承认我们的宗教是好的，如果说他们反对公开传教而且不允许传教士进入内地，那只是因为政治原因，他们担心我们借口传教而别有所图。他们大致知道欧洲人对印度的征服，担心在中国发生类似的事。如能在这一点上让他们放心，我们不久便能获得所希望的一切许可。²⁷

这段话说的非常明确，在乾隆时代在朝廷中接触到传教士的皇帝和大臣们，对天主教的认识还是与雍正时代一样的。禁教本身非为宗教，而是对借传教别有所图的忧虑。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11月3日于北京）韩国英（Cibot）信中称：

您大概不会不知道最近几年来我们遭受的来自偶像崇拜者们的迫害。您无法相信他们把我们在非基督教徒的头脑中抹黑到何等地步。若不是皇帝特别保护，我们准会被全部撵走。皇帝比如何人都更了解此间强加于我们的控告是错误的，因此运用其一切影响保护我们并把我们留在他的国家。上帝掌握着君主们的心，它使皇帝十分善待我们，我们对他的好意也深为满意。这位君主是全凭亲自观察而作出判断的，他公正、公平、容不得他人作出任何一点不公道的事来。他性格温和，平易近人，乐于倾听无辜者的自我辩护；但他对迫害者却是严厉的，动辄便会发怒，而且会予以惩处。阿谀奉承对他似乎起不了多大作用。

您知道，人们是从攻击在钦天监效力传教士开始对我们进行迫害的。但皇帝很器

仁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94页。

²⁵ [法]杜赫德编，[中]耿升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IV，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322页。

²⁶ [法]杜赫德编，[中]耿升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IV，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20页。

²⁷ [法]杜赫德编，[中]吕一民、沈坚、郑德弟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IV，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213页。